

城镇化制约了工业化升级发展吗

——基于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的视角

□潘锦云 姜凌 丁羊林

(安庆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良性发展的城镇化促进工业化转型升级,有助于实现城镇和产业融合发展,但我国城镇化在理论认识上存在“去工业化”等误区,在实践中存在伪城镇化等现象。我国城镇化畸形发展带来的诸多弊端,不仅成为制约工业化升级发展的因素,也已经成为发展新型城镇化的障碍。只有把握好中级水平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发展关系,处理好产城融合发展新理念对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协调好城镇化和工业化在新“四化”中的作用,才会在同步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关键词: 畸形城镇化; 工业化; 产城融合; 产城分离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56(2014)09—0041—09

一、引言

中国城镇化畸形发展带来的诟病备受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中国城镇化发展中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是城镇化速度与质量出了问题,还是与工业化发展不相适应,城镇化是超前还是滞后发展了?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城镇化已经影响工业化升级发展,但在影响原因上有两种相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低城镇化率拖累了工业化^[1];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超前发展的城镇化拖累了工业化^[2]。到底是超前还是滞后的城镇化拖累了工业化发展。本文将通过研究揭示:同处于中级水平的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应保持协同还是错位发展关系,以及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对解决中国城镇化问题的意义何在。

二、关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关系认识的误区

中国城镇化超前发展已经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投资挤出效应,集中表现在工业化的步伐明显减缓,用于工业发展的资本在高利润率的指挥棒指引下,纷纷转移到房地产领域,实体经济空心化现象明显,2011年以来温州等地爆发金融危机可以佐证。只有看清楚城镇化和工业化如同孪生兄妹关系,才能使两者按照自身发展规律而发展^[3]。任何割裂城镇化去谈工业化发展,或割裂工业化去谈城镇化发展,不仅会在理论上犯漠视系统论而造成的逻辑错误,而且会在实践中犯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错误。

(一)“去工业化”发展城镇化的理论认识误区

建国以后,我国工业化主要依赖农业补贴和粗放模式而实现增长。不仅伤害了原本就很脆弱的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城市化互动机制研究”(12BJL081);2014年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产城融合视角下安徽省城镇化质量提升路径研究”(AHSKQ2014D53)

国农业,同时也因工业发展带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能等社会问题。针对这些日益突出的城镇化发展问题,有些学者提出经济应走转型发展道路,鼓励中国经济走“去工业化”发展道路。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是有自己内在需求的规律,并不依赖工业化而发展,发展城镇化契合当下中国经济现实诉求,不仅拉动了经济发展,而且为本地财政赢得了巨额资金,为发挥看得见手的作用提供调控的空间。^[4]持有此理论的学者过分夸大工业化初期阶段发展带来的问题,忽视中国工业化任务远未完成这一基本事实。同时也忽略一个基本的因果判断,即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动因,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忽视工业化在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作用,理论上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实践上必然犯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错误。

(二)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理论认识误区

由于受到二元户籍制度的束缚和实施积极的工业化战略,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农业和城镇发展,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农民工开始大规模迁移到城镇工作或居住,以常住人口为特征的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尤其1999年实施房改政策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获得爆发式增长,直接推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3.73%,1978—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用30年时间完成欧美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城镇化成就^①。但是理论界一直有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工业化的声音,一些学者认为工业化发展快于城镇化,因此要大力发展城镇化。这种理论认识至少有两个误区。一是判断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更多是基于户籍城镇化率的判断,而无视十余年来我国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现实。二是我国城镇化发展不仅实现了对工业化的追赶超越(如图1所示),而且其超常规发展逐渐显现出对工业化升级发展的制约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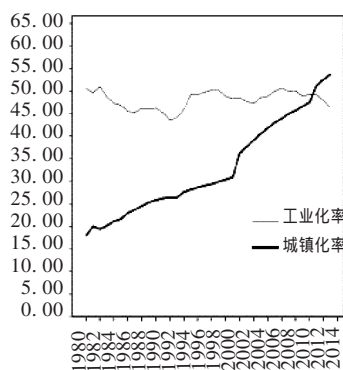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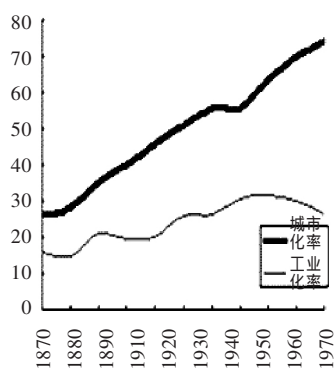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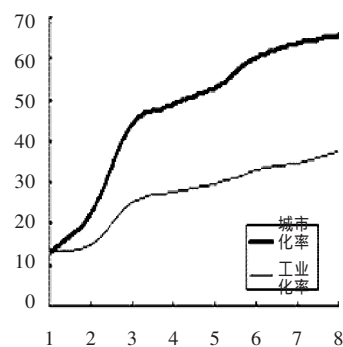


图3 钱纳里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

(三)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等伪城镇化的实践误区

我国伪城镇化现象集中表现在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并存。2013年城镇化率为53.73%,比2012年提高1.16个百分点,全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了2.89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45亿人^②,“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一方面以常住人口来统计和发布城镇化率,虽然能客观反映当下城镇化发展的现实与无奈,但户籍可自由流动的城镇化仍未被突破,未能真正体现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特征的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②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C].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2/t20140224_514970.html.

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伴随着高速发展的城镇化,城市面积快速地向城郊扩展,开发区和新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跑马圈地”为特征的空间城镇化现象明显,但工业化发展速度明显放缓。2013年中国工业化为43.89%,比上年降低了1.11个百分点,是2000年以来的最低点,其中2006年工业化率达到48%^①,为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关系如图1所示,城镇化率逐年升高,工业化率基本维持45%水平左右,但近五年来工业化率曲线下降趋势明显,并于城镇化率曲线交叉,这与美国(如图2)^[5]和钱纳里(如图3)^[6]的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曲线有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图2和图3两条曲线未形成交叉点,并呈分离趋势,而图1中工业化率曲线不仅与城镇化率曲线相交,并在相交前工业化率曲线一直在城镇化率曲线的上方。

(四)鬼城与睡城现象并存等产城分离的实践误区

我国很多地区城镇化“大跃进式”发展,导致这些地区城镇化和产业发展严重脱节,尤其与工业化发展速度不相匹配。缺乏相应的产业支撑,涌现了一批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现象,于是就出现新城变“鬼城”和老城变“睡城”等典型的产城分离现象。首先,新城未实现产城融合发展,不是工业集中区就是商业住宅区。所谓产城融合是指城市依托产业而发展,产业依赖城市而不断演进,两者相伴相生并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很多新城建设存在两种类型。一是以产业园区为代表。工厂林立,产业集聚度较高,但见物不见人,缺乏成熟的社区,更缺乏城镇应有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功能,因此,造成白天新城人头攒动,夜晚新城人去厂空等现象。二是以纯商业住宅区为代表。新城规划和建设档次虽高,若没有产业依托,即使新城有再高端的社区,其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也需要时间来检验。其次,老城改造推高房价,挤走产业让老城变成睡城。在城镇化大跃进式发展中,几乎所有城市的老城区搬走了原先的产业,让老城变成了真正的睡城。同时,由于集中了城市最优势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资源,老城的再城镇化运动将房价节节推高,使得城镇化发展贴上“房地产化”的标签。

(五)过度城镇化对工业化形成挤出效应的实践误区

由于我国城镇化陷入房地产化的误区^[7],并在投资和投机的驱动下,远离正常水平的高房价创造了无数财富效应,有限的社会资源大量聚集城镇化领域,使得社会资源在其他行业投入明显减少。利益至上是市场经济普遍遵循的原则,不断推高的房价让相关行业和投资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而工业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长期的资本积累与投资,还需要承担无处不在的研发和营销风险。在房地产业财富效应的带动下,从事工业经济的企业家必然趋利避害,放弃实体经济的经营,转而买地盖房子卖房子,获取远比实体经济高的利润。这就是过度或畸形的中国城镇化模式对工业经济形成投资挤出效应。另外,由于城镇化畸形发展,不仅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资本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其发展速度呈下滑趋势,而且高利润的房地产行业不断吞噬原本相对健康的中国经济机体,诱发我国宏观经济2013年以来呈现明显的下行发展趋势。

三、畸形发展的城镇化制约工业化升级

一般来说,常态即良性发展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并统一于一个国家现代化实践中,两者如同鸟之二翼既不可偏废也不可偏颇,否则都将因失去平衡而危害快速飞行中的经济安全。事

^①本文的工业化率是指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依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的,与国内一些学者采用人均生产总值计算方法不同。

实上,我国目前畸形发展的城镇化不仅拖累工业化正常发展,而且对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工业化形成比较明显的制约效应。

(一) 常态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升级发展的一般路径

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不仅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工业化发展与升级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力量。本文认为,工业化要实现升级发展就必须获得优质的人力资源、巨大的市场需求、广阔的地理空间和完善的配套服务,这些构成工业化升级发展对市场发出的需求;同时,良性发展的城镇化必将产生大量农民进城、消费需求扩大、城区面积外延和公共服务大幅度增强等绩效,诸多发展绩效既是城镇化常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同时向工业化供给其发展绩效。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城镇化发展绩效构成的供给和工业化实现升级发展构成的需求形成了有效的市场耦合,形成了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升级发展的一般市场均衡,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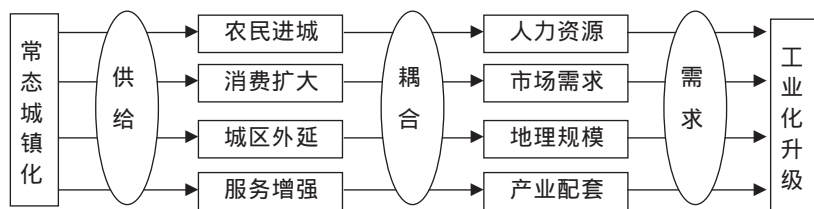


图4 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升级发展的一般路径

1. 常态城镇化为工业化升级发展供给优质的人力资源

工业化升级发展依靠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但终究离不开“人”特别是优质人力资源的支撑。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和

再生产理论,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是已经固化了的劳动,而人的劳动是活劳动,要发挥前者作用,就必须让两者有效结合。处于中级水平的我国工业化基本完成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任务,但要获得升级发展并达到高级阶段水平,就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人力资源。优质的人力资源从哪里来,一部分来自现有的城市居民,但其数量远远满足不了工业化升级发展对人力资源的巨大需求。那么,另外大部分就只能来自于农村,只能依赖于城镇化发展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他们经过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双重洗礼后,变成合格甚至优秀的产业工人,成为工业化升级发展的重要生力军。本文认为,常态城镇化进程中从农村迁移出来的农民,与当前人口城镇化农民被赶进城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前者是城镇化顺应其本身发展规律的自然结果,后者是违背城镇化发展规律的恶果。因此,前者能够为工业化升级发展储备大量的优质人力资源,而后者只能成为农民工,成为半城镇化的“牺牲品”。

2. 常态城镇化为工业化升级发展供给巨大的市场需求

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城镇人口不仅得到了较快增长,而且以城镇居民为代表的消费需求也将得到相应的增长。首先,城镇居民消费能力和水平一般要比农村居民高。以2012年为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6515元,而城镇居民高达21120元,是农民居民消费额的3.2倍^①。所以,城镇居民的购买力要比农村居民强得多。其次,城镇居民对产品的消费要求一般要比农村居民高。一般来说,消费要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城镇居民消费要求高主要体现在对产品的质量、性能和科技性上,并通过市场消费直接反馈对工业化升级发展的强烈诉求。最后,城镇化发展造就更大的市场规模,构成了工业化升级发展的前提条件。就实现规模经济而言,工业经济要升级发展离不开市场对其提供巨大的消费需求,而这一需求恰好可以由常态城镇化发展带来市场需求增长来提供。

3. 常态城镇化为工业化升级发展供给广阔的地理空间

^① 2012年中国经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我国工业化升级发展既需要优质人力资源和相应的市场需求,还需要为其提供足够广阔的地理发展空间。原因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工业经济规模扩张的需要。我国工业化水平目前处于中级阶段,工业化任务远未完成。因此,我国工业化既面临规模扩张,又面临升级发展双重困境。要实现工业化的规模扩张,就需要城市提供适度的区域发展空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一方面加速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为了吸纳更多人口的迁移,城市地理范围也要向外延伸。同时,更多的城镇居民需要社会为其提供就业岗位,除了服务业吸纳就业以外,处于大力发展阶段我国工业化也必将分担这一重任。二是我国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需要。我国工业化长期依赖高能耗高污染等传统发展路径,目前已经走到尽头。新型工业化战略核心是走转型和升级发展之路,对我国工业布局重新进行科学安排,对原先一大批不合理布局的工业企业实施整体搬迁改造,这就需要重新规划一批工业园区,需要城市向郊区拓展提供工业化升级发展所需的地理空间。

4. 常态城镇化为工业化升级发展供给先进的配套服务

城镇化导致人口迅速集聚和城市地理空间快速扩张,服务业因此而兴盛起来,特别是随着城镇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现代服务业加速崛起^[8]。根据对工业化服务内容的差异,一般将现代服务业分为生产性和生活性现代服务业^[9]。首先,工业化升级发展离不开以研发、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生产性现代服务业的参与和支撑。城镇化和工业化进入中级水平后,产业分工越来越细,也越来越需要产业统筹发展。其次,工业化需要大量人力资源主导其升级发展。城镇化带来了完善甚至先进的诸如旅游休闲、娱乐健身、市政服务等生活性现代服务业,这就为工业化升级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提供生活上尽可能的便利、舒适和享受,承担了工业化升级发展的后勤保障任务。常态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工业化对其提供就业和财政收入的支持,而工业化升级发展需要城市提供现代服务业的支撑。因此,常态城镇化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并将最终实现城镇和产业融合发展。

(二) 畸形城镇化对工业化发展的危害

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遵循规律发展的城镇化将彰显人类建设家园的智慧,将人类最复杂作品一代代建设和传承下去;相反,偏离正常轨道而畸形发展的城镇化将是人类共同的灾难。本文限于篇幅,仅讨论其对工业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1. 城镇和产业分离发展,拖累工业化的融合发展

如前文所述,畸形城镇化有着显著的人为造城特征,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三、四线城市尤其明显。即使在经济较发达的一、二线城市,畸形城镇化也会带来城镇和产业在空间上分离,出现“睡城”和“鬼城”并存现象^[10],造成城市生活和工作成本随着城镇化率提高而攀升的不正常结果。一方面,畸形城镇化如同脱缰野马无视发展规律,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另一方面,畸形城镇化人为地将城镇化和工业化互相依存关系割裂开来,使得工业化的发展得不到城镇化的支持,极大地拖累工业化对实现城镇和产业融合发展的合理诉求。从目前中国城镇化实践来看,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城市规划较滞后,或未出现大面积畸形城镇化发展的二、三线城市,不仅没有出现“鬼城”和“睡城”现象,而且通过市场自发真正实现城镇和产业融合发展的目标。

2. 房价远离地产价值,吞噬工业化的发展资本

通常用房价收入比和房屋租售比等核心指标来衡量房价是否偏离价值,或者说房地产价格有没有泡沫。以房价收入比为例,世界银行的标准是3—6倍为合理区间,其中发达国家为3—4倍,发展中国家

为 4—6 倍。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陈永杰(2014)测算出我国 2012 年平均房价收入比为 7.4 倍,并认为我国实际房价收入比平均在 8 倍以上,一线和二线城市一般在 10—15 倍以上^[11]。目前,我国房屋租售比也远远超出国际公认合理区间,获得的结论也进一步证明房价远离地产价值。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房价导致高利润这一市场传导机制诱发中国城镇化畸形发展。在市场利益驱使下,原本属于工业的资本逐渐大量转移到房地产领域,使得原本就不受资本青睐的工业化有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巨大风险。以高房价为代表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不仅给人们造成发展城镇化就可以发展经济,甚至造成发展城镇化就能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这一假象,而且极大地占用工业化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源,使得工业化发展停滞不前,更谈不上升级发展。

3. 户籍捆绑农民工,增加工业化的人力成本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前,我国市场经济被抑制,通过工农价格剪刀差,“三农”为中国工业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正式确立市场经济制度以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不仅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制约因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城镇化走上了畸形发展道路,其中半城镇化就是其典型的副产品。半城镇化的危害主要有:首先,提高了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成本,并同时带来许多隐性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必将为中国工业化甚至现代化发展埋下隐患。其次,虽然农民工为工业化贡献巨大,但农民工未实现市民化使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其在工业化中的地位也被边缘化。最后,以上两个结果直接导致我国工业化的人力成本提高。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工候鸟式就业必然要求有相应工资保证其迁徙支出,传递到工业企业就必然提高工业化发展成本;二是由于农民工承担不起高房价,在城镇化中无法实现市民化,因此就无法享受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特别是优质的教育和培训服务,当农民工就业后就转嫁到工业企业任职培训环节中。因此,这些成本终究要在工业化发展中付出,间接地提高工业化的人力成本。

4. 实体经济贡献被漠视,诱发工业化的进程停滞

参与城镇化发展的投资或投机者、企业、相关产业获取高额回报,甚至地方政府也参与其中,形成了全民共推城镇化走上非常态发展模式。不仅将我国城镇化发展引向歧途,将社会资源和发展中心转移到畸形城镇化领域,而且对工业等其他实体经济形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从目前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实践来看,近十年来在城镇化获得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工业化速度和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任务以后,其工业化率才开始呈下降趋势,是符合三大产业发展规律的,但我国工业化任务远未完成,就出现其进程减缓现象,并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如果不能得到及时修正,将会诱发工业化进程停滞的巨大风险。发展实体经济需要城镇化提供服务,主要通过房地产和公共产品实现对“人”和“物”的服务,但城镇化发展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取决于实体经济发展程度,决定于工业化发展水平,离开实体经济而发展城镇化必然走上畸形发展道路。

(三) 畸形城镇化制约工业化升级的理论逻辑

畸形城镇化的危害不仅对工业化发展形成拖累,而且直接制约工业化升级。与常态城镇化相比,畸形城镇化直接诱发青年人才匮乏、投资领域偏颇、空间有形藩篱、发展路径单一和结构失衡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将进一步引致产业创新滞后、融资成本升高、产业和城镇分离、“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简称“四化”,下同)进程异步和经济发展效率低下等结果,这些结果叠加后直接成为制约工

业化升级的因素,其理论逻辑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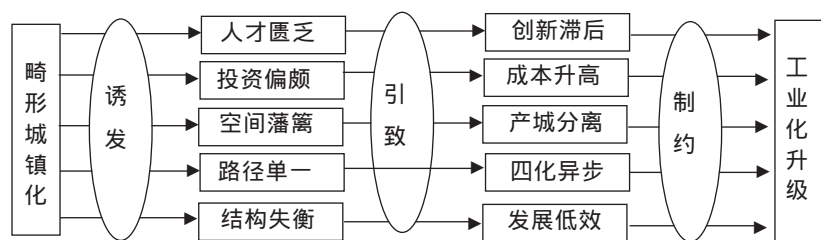


图5 畸形城镇化制约工业化升级发展的理论逻辑

1. 青年人才匮乏引致创新滞后

高昂的房价已经成为畸形城镇化最大的诟病,其直接后果将导致优秀的青年人才因为购房无望而被迫离开城市,尤其放弃在一、二线大中城市的工作。

最终会形成哪里城镇化畸形程度高,哪里就会出现青年人才匮乏的局面。工业化升级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在于创新,而创新又来自于人才的智力劳动。因此,人才匮乏就成为创新滞后的主要因素。将青年人才挡在城市无形的城墙之外,不仅制约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更在“人”的要素上对工业化升级构成最重要的制约。

2. 投资领域偏颇引致成本升高

畸形城镇化带来远高于平均利润率的投资回报,引致全社会资源因利益驱动向城镇化领域大量转移,进一步使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我国城镇化过度繁荣。一方面,赚钱效应在这个领域被过分放大,人们对投资回报率的期望远远超出以往任何时期的水平,于是各种名目的小额贷款担保公司、典当行等所谓金融创新企业应运而生,资金成本被畸形城镇化人为地抬高;另一面,实体经济因投资回报率低,被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或投资人遗忘,正处于升级发展阶段的我国工业企业,为了能够获得生存与发展也不得不接受融资成本高带来的巨大经营风险。

3. 有形空间藩篱引致区位优势

工业化在升级发展中,不仅需要人才、技术和资本要素的贡献,也需要获得升级所需的区位优势。这些优势首先来自于规模经济优势,同时,因城镇化水平提高而获得更加优质的配套服务优势。而畸形城镇化分割了与工业化紧密协作关系,在产业和城镇之间形成有形的空间藩篱,引致产城融合优势演变为区位优势,并成为工业化升级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位优势成为工业化升级的地理制约,束缚了其升级空间;二是区位优势直接增加工业化升级成本,增加了不必要甚至重复的配套成本,而这些服务通常本可以由产城融合发展带来的外部经济性来提供。

4. 发展路径单一引致四化异步

随着畸形城镇化的发展,社会资源将越来越集中在房地产领域。由于受到各种投资和投机资金的追捧,资源过度配置的领域将迅速出现资产泡沫。同时,在一定时期内,社会资源总量是有限的,资源在一个领域过分集中,必然导致其他领域资源稀少,全社会资源配置失衡。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大力发展阶段,但畸形发展的城镇化不仅让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而且使得中国经济走向单一发展路径,并至少在社会资源配置平衡上已经制约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造成“四化”进程出现了不同步不协调的现象,也必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潜在威胁。

5. 经济结构失衡引致发展低效

畸形城镇化诱发资源配置失衡,其直接结果就是经济结构失衡,集中表现为实体经济空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但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获得超前发展,整体经济发展效率低下,并制约工业化升级。

在一定程度上,产业能否升级与企业能否创新决定经济发展效率,但经济发展低效率反过来也影响产业升级。因为低效率发展必然带来投资效益不高,既会导致投资主体热情缺乏,也会制约工业企业自身升级的欲望与动力。所以,畸形城镇化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失衡,引致经济发展效率低下,从而最终制约工业化升级。

四、在同步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一) 把握好中级水平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发展关系

鉴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基本可以判断两者都处在中级水平发展阶段。本文认为,当前城镇化出现畸形发展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搞清楚同处于中级水平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关系应如何处理,才会出现诸如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因此要大力发展城镇化等论调。不可否认,在两者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着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后,城镇化又促进工业化进步的互动模式,但这种互动模式仅限定于初级发展水平内。只要进入中级发展水平,两者互动模式就不存在谁先后发展,谁带动谁和谁促进谁发展等问题,也就是说两者的关系应是在中级阶段同步发展共同迈向高级阶段,否则就会出现畸形城镇化或工业化的发展误区。因此,认清中级水平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同步发展关系,就显得异常重要,这也是把握好两者同步发展关系的第一步。

其次,要调整好两者已经扭曲的发展关系。从矫正城镇化畸形发展入手,将城镇化发展拉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将“人”和“物”的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并与工业化保持同步发展。一方面,畸形城镇化获得了超前发展需要适度减速;另一方面,要大力提升工业化发展水平,促进工业化升级发展,因为要保持与城镇化同步发展,目前工业化水平是滞后的,所以才出现半城镇化等现象。如果两者获得同步发展,显著的特征是城镇和产业不再分离发展,并最终实现融合发展,这种产城融合模式也是一些地区近年来在积极探索的一种全新发展模式,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实践效果。

(二) 处理好产城融合发展新理念对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城镇成为产业发展的载体,产业成为城镇发展的基础。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的基本理念是把产业发展和城镇人口集聚科学合理地融合在一起,让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发展,提升城镇化质量^[12]。产城融合在理论界和实践界都是一个新的发展理念,有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有的学者认为产城融合发展会带来环境问题。其实,产城融合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产物。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走高能耗高污染为特征的道路。为了城市居民免受工业污染,人为地把生产区和生活区分开。因此,把“产”与“城”分离发展是符合传统城市功能分区的需要。但随着城市规模逐渐扩大,产城分离造成工作和生活成本高的弊端就明显地暴露出来^[13]。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规模迅速扩张,产城分离发展的负面效应更为显著。

随着工业文明特别是技术的进步,在环保投入得到充分保障的条件下,工业生产变成洁净生产成为可能,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化逐渐退出历史。于是,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就在一些地区试点开来。当然,产城融合发展对传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工业化要变成彻底无污染的工业生产。如果技术和环保投入不能满足时,即使对地方经济增长有较大贡献的,也不能让这样的工业企业开工生产。其次,城镇发展要以支撑工业化升级发展为目标,提供人力资源、公共产品和现代服务业为核心,做好产业发展的“后勤部长”。

(三) 协调好城镇化和工业化在新“四化”中的作用

城镇化畸形发展与工业化升级缓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者在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等新“四化”系统没有准确定位,也没有发挥好其在新“四化”系统应该发挥的作用。新“四化”要求城镇化和工业化为农业现代化服务,而信息化作为全新的技术手段,应为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提供崭新的技术平台。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城镇化和工业化要服从于新“四化”核心目标。新“四化”的提出为实现现代化指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and 路径。因此,城镇化和工业化既要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选择合适路径加快发展^[14],又不能以邻为壑和自成体系,成为制约因素并伤害新“四化”整体目标的实现。如当前城镇化畸形发展造成实体经济的边缘化,延缓工业化升级进程。另外,畸形城镇化还造成农民进城成本高,制约农业现代化的推进,等等。总之,只有把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融入到新“四化”核心目标,才能实现两者局部和新“四化”整体利益的协调和共赢。

二是城镇化和工业化要形成合力服务于新“四化”。城镇化和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征途上的两匹良马。前文已经论述在同处中级水平的背景下,这两匹良马应并驾齐驱,形成合力拉动中国现代化这驾超级马车。当前一些地区产城分离现象,如同两匹良马,在同一个水平线拉马车,但方向相反,结果就会造成中国现代化原地踏步,并可能诱发中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这两匹良马是汗血宝马,马车的命运就会更加糟糕。因此,城镇化和工业化必须形成最大合力,共同拉动新“四化”实现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 [1] 谢泽锋. 低城镇化拖累工业化[J]. 英才, 2012, (12): 120 - 121.
- [2] 华 民. 没有工业化支持的城镇化不可持续 谨防错误的城镇化“运动”[J]. 人民论坛, 2013, (9): 57 - 59.
- [3] 潘锦云等. 新农村建设的拖累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吗[J]. 经济学家, 2007, (4): 83 - 87.
- [4] 肖金成. 城镇化与城市化对立是错误的城镇化十年进程反思[J]. 人民论坛, 2013, (2): 18 - 19.
- [5] 张庭伟. 1950—2050 年美国城市变化的因素分析及借鉴(上)[J]. 城市规划, 2010, (8): 39 - 47.
- [6] 霍利斯. 钱纳里, 莫伊思. 赛尔昆. 发展的型式 1950—1970[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23 - 56.
- [7] 袁业飞. 城镇化“大跃进”如何“去伪存真”?——聚焦新一轮城镇化背后的隐忧[J]. 中华建设, 2011, (7): 6 - 15.
- [8] 潘锦云, 杨国才. 农业现代服务业: 以工促农的产业路径[J]. 经济学家, 2009, (9): 61 - 67.
- [9] 潘锦云等. 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 经济学家, 2011, (12): 40 - 47.
- [10] 刘荣增, 王淑华. 城市新区的产城融合[J]. 城市问题, 2013, (6): 18 - 22.
- [11] 陈永杰. 专家称房价房租已远超百姓有效支付能力[N]. 第一财经日报, 2014 - 04 - 28.
- [12] 潘锦云, 姜 凌. 提升城镇化质量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一个文献的述评[J].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2014, (1): 1 - 9.
- [13] 朱 晋, 文海斌. “产城融合”描绘新城市路径[N]. 南方日报, 2014 - 03 - 09.
- [14] 陈二厚, 王海鹰. 同步推进新型四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N]. 人民日报, 2013 - 03 - 06.

(收稿日期: 2014—06—18 责任编辑: 杨锦英)